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第一辑）

技术变革与 广播媒介转型

● 李建刚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沿 (第一辑)

技术变革与 广播媒介转型

◎ 李建刚 著

622
1181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变革与广播媒介转型/李建刚著. —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657-0085-9

I. ①技… II. ①李… III. ①广播—传播媒介—技术革新
IV. ①G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470 号

技术变革与广播媒介转型

作 者 李建刚

策 划 欣 雯 刘大年

责任编辑 李钊祥 刘大年

封面设计 魏 东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0085-9/G·008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 1

第 1 章 技术的观念 / 4

技术是什么 / 4

技术哲学的兴起 / 6

批判的技术理论 / 8

被忽略的整体构造 / 10

技术系统 / 12

技术传播模式 / 13

“嵌入”的社会观点 / 15

第 2 章 技术的传播 / 17

历史变迁 / 18

信息技术革命 / 19

创新与扩散 / 21

信息社会 / 22

技术创新扩散 / 24

技术影响扩散 / 26

不断变化的参与者 / 30

第 3 章 广播的社会化 / 31

广播技术的基础 / 32

2 ◇ 技术变革与广播媒介转型

- 社会影响因素 / 35
- 黄金时代 / 37
- 戴维·沙诺夫的预测 / 37
- 商业模式 / 39
- 电视的竞争 / 40
- 广播的竞争 / 41
- 类型化电台 / 43
- 电台的盈利 / 44
- 调频广播的崛起 / 46
- FCC 的推动 / 48
- 国际广播 / 50
- 宣传工具 / 51
- 国际宣传 / 52
- 广播的转变 / 55

第4章 轨迹与变革 / 57

- 旧中国广播的起步 / 57
- 国民党的管控 / 59
- 黑夜里的明灯 / 60
- 新中国广播宣传的任务 / 63
- 广播收音网 / 65
- 改造私营广播 / 66
- 自力更生办广播 / 67
- 改进广播工作 / 69
- 现场广播大会 / 71
- 节目内容的发展 / 72
- “文革”的经验教训 / 74
- 经济体制改革 / 76
- 四级办广播电视 / 77
- 专业化经营 / 79

传送手段现代化 / 80

第 5 章 新的环境 / 83

经济全球化 / 83

文化倾销 / 85

媒介汇流 / 86

交流工具的变化 / 87

知识本性的变化 / 88

广播的类型化 / 89

虚拟与现实的融合 / 91

广播业与电信业的融合 / 92

文化趋同的调控 / 93

技术促进民主的想象 / 94

第 6 章 主动的受众 / 96

网络一代 / 96

使用与满足 / 97

媒介系统的组合 / 99

媒介系统的依赖 / 100

信息资源的社会效力 / 102

人口统计学的调查 / 104

第 7 章 数字化延伸 / 106

新革命 / 107

数字音频广播 / 108

卫星音频广播 / 110

缺失的技术宣传 / 112

启动的关键 / 113

网络广播 / 115

J-Wave 调频的启示 / 119

4 ◇ 技术变革与广播媒介转型

互联网新战略 / 120

播客之道 / 123

交互的声音文化 / 125

终端之争 / 126

增强与受众的联系 / 128

逆向的媒介设计 / 129

信息控制的偏移 / 130

第8章 FCC的监管 / 131

私有制基础 / 132

广播业的归属 / 133

FCC的历史 / 134

促进竞争与放松管制 / 137

技术性规定 / 138

结构性规定 / 139

节目内容的要求 / 141

利益博弈 / 145

1996 联邦电信法案 / 147

第9章 公共广播的转变 / 150

社会背景 / 151

困境 / 151

英国广播业的改革 / 153

公共服务机构 / 154

BBC 定位的转变 / 155

英国通信办公室 / 156

科学预测 / 158

数字广播时代 / 159

监管难题 / 161

第 10 章 趋前的规制 / 163

媒介所有制差异 / 163

新自由主义思潮 / 165

企业的推动力 / 166

法律体系 / 166

立足国情 / 167

三网融合 / 169

商业化侵蚀 / 170

规制滞后 / 172

第 11 章 信息化广播 / 174

前景传播 / 174

数字化设计 / 176

重视终端 / 178

信息观念 / 179

责任与压力 / 180

传媒教育 / 182

第 12 章 分化与整合 / 184

转型社会 / 184

中介变量 / 186

消除“知沟” / 188

社会协调 / 191

体制改革 / 192

主要参考文献 / 196

致谢 / 204

引 言

人们赖以生存的媒介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线电波成为社会的“座架”并不断演化和衍生出新的触角。媒介、技术、受众,三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亲密,直至完全模糊。传播技术存在于无线电媒介之中,传播技术也存在于人们看问题的方式里。任何以“弱势媒体”的学术思路考察广播发展路径的研究,都可能陷入片面、非客观化的陷阱。广播对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建设的贡献,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恰当而全面地评估广播的社会价值在今后将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任务。

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广播的未来发展,本书针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理解传播技术?技术如何成为信息社会的系统构架?技术发展对于广播创新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媒介监管与技术政策对于广播业可持续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之所以格外强调技术的社会建构,是因为本书的理论思考采用了一种实验性的探索方式,尝试从新的维度考察广播的内涵和外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角度切入,以广播作为媒介运动的参考坐标,以系统观作为观察的主要方法。广播既是媒介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其他媒介诸多思考分析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广播尤其适合作为社会媒介分析的样本,典型而生动。

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本书尝试从技术哲学、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的角度对于传播技术进行新的解读,对广播与技术的关系进行辨析。本书力求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误区,避免“技术工具论”的盲目论断。将技术视为单纯工具问题是不客观的。技术是社会的产物,在技术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技术的发展和作用,社会个体同样受其影响而在技术应用与能力方面呈现差异。广播并非由技术力量单独驱动,发展过程受到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影响。冲突则产生于广播内部及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中。有的新技术和论题关系不甚密切,点到为止。既

是限于结构上的考虑,也是避免歧路亡羊。

本研究涉及的内容和容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涉及媒介环境变迁、技术创新与扩散、技术系统特性、受众行为和媒介关系变化、广播数字化变革、广播在社会转型期的信息效能及传播规制的调适。研究引入技术传播的思考维度,对于广播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分析有相当部分以非技术的形式展开。借助多学科视角和已有研究观点的碰撞整合,融合互补,为论题的思考注入新的内涵和意义。

广播技术应用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更为综合、全面、富有竞争力的广播传播形态。这不仅指技术创新能力或者电台的经济成本,它还包括技术规制、受众态度及选择。本研究对待所谓传播技术引发广播大变革的某些言论提出修正,并力求剔除当前流行的关于广播变革的某些不切实际的“畅想”。

目前,大众传播的理论研究存在着“掩盖”人际传播的趋势,社会对大众传播的期望是在社会层次上发挥与人际传播同样性质的传播功能。这为研究广播的社会功能提供理论参照。广播研究应当关注两个层面:一是广播与社会,看重那些与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之间的联系,社会结构与媒体相互间的影响作用;二是广播与个体,技术成为信息载体,成为选择控制的工具。这显示出媒体和受众之间联系的新特征。“使用与满足理论”被认为是研究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受众行为变化的有效工具;“媒介依赖论”可以对信息环境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深入解释;“发展传播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和政治、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案例;“社会技术论”包含丰富的“系统理论”思想,但是更侧重社会意义。不同的理论工具在讨论不同层面的问题时各个击破,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可以起到概括、归纳和指导作用。

无线电广播是促进我国转型发展的重要社会媒介。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提升了传播效力。广播是偏远、落后地区可负担的一种传播形式,广播可以缝合社会转型中的心理裂缝,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公平。同时要注意,发展中国家对于新技术使用应当保持批判的眼光。新技术不能直接产生社会效益,它必须首先作用于人,以人为中介才会发生转化,显示其社会功能。

本书对国内广播规制的研究,参考和借鉴了美国、英国广播业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主要体现在运用有关成果审视和分析中国广播的体制问题和改革发展问题。美国是一个适应国家利益,不断完善法制,依法行政的国家。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作为监管机构,在平衡媒介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职能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信息产业的国家之一,其政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

规制定,对行业发展起到保障与促进作用。英国广播业改革在保守中稳步向前。几年来英国广播公司(BBC)大胆改革,成为欧洲新媒介先锋。我国从1985年开始研究制定国家科技信息政策,1990年颁布有线电视有关法规,但还没有成系统的国家信息政策法律出台,尤其在互联网政策方面。总结完善政策研究和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在我国还需提高到更高的层面。

中国广播业的发展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立足于现实,考虑社会转型的诸多难题和复杂因素。鼓励广播应用新技术实现传播多样化,提高竞争力,充当起消除垄断、保障社会公平、保护受众利益的舆论监督角色。这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传播技术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播创新发展的内涵也应不断更新。有三点需要长期坚持,即:加强对于声音传播的研究;加强公共信息与文化建设;加强传播技术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弥合人与信息的接口,这是广播目前一些新兴模式发展起来的关键因素。国家应当尽早建立和完善鼓励创新发展的媒介机制与市场环境,政府要看到无线电频谱资源作为国家公共资源的核心价值,这是广播在未来获得持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证。

第1章 技术的观念

关于技术的研究将导致对于这个地球上所有媒介未来的思考。广播在 21 世纪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技术的采用和控制——它会影响广播的方向,影响广播的形态,影响听众的喜好,乃至影响广泛的社会个体和组织对其社会价值的公共判断。

广播是电磁技术的科学结晶,但是真正发展起来却是整个社会的产物。技术作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潜在的影响力远未表现出来。

技术是什么

人类智慧的进步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社会关系是人们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所形成的。这些关系依次由物质环境、技术和技术的使用方式所决定。

技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对社会构成和意识形态发挥过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技术展示人与自然之间的活性关系,展示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技术决定人类生活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和由这些关系产生的思想观念。

我们在讨论技术时,容易出现两个对称性错误:一个错误与人的定义有关——人被看作是脆弱而温顺的东西,必须保护“它”不被客观化;另一个错误与技术有关,认为技术越是远离激情、主观性和社会利益,功效就越大,创造的利润也越大。如果从这两极出发,将很难把它们联系起来,因为彼此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点:一方面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弱者,另一方面是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两者之间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而人类就生活在二者之间。

古希腊人把技术看作有关艺术和实用技艺的概括。拉普曾说,“只要试图给

‘技术’一词下定义,人们就会发现离开这个术语的模糊性,就等于不适当地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从而抹杀了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复杂性。”^①技术和它的作用能否成为一个主题并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要从概念上作出界定。

技术的定义不胜枚举,从大的特征类型上分为广义和狭义。人文学科的学者一般倾向于广义定义。一切属于“器”、“艺”、“技”、“术”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技术。广义的定义将一些非技术类要素包括进去,对应的技术形象是模糊的。工程技术专家一般倾向于狭义定义,指人造的“器”和围绕该种“器”的方法,如机器、工具制造和使用、工程技术等。

从定义的学科方法看,技术定义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哲学上的定义,常常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或方法论一并讨论。海德格尔把技术定义为“引导、促成自然的显露”,德绍尔定义是“发明和超验形式的物质现实化”;从认识论上看,把技术定义为“应用科学”(邦格);从方法论上,把技术定义为方法和手段的总体,这是技术定义中最普遍的观点。这类定义试图把握技术超社会、超历史的本质,给出技术概念哲学意义上的元理论,这是其积极意义。不过这类定义一般抽象且宽泛,难有个性特征,表达不明确,缺乏实际效用。

第二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即把技术看作社会的某个决定因素,例如埃吕尔在《技术社会》(1954)一书中,把技术定义为“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具有绝对有效性的方法的整体。”技术被赋予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功能,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这类定义一般重在突出技术的社会价值特征,忽视技术功能。

第三类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即把技术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等同科学、艺术、宗教、体育等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这类定义也在过窄和过泛两极间跳跃。一方面,“活动”和“知识”、“产品”等一起构成技术的内在环节,而非技术本身;另一方面,“活动”一说显得笼统,无法切中要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但技术,科学、艺术、政治等都可以定义为“人的解放”。

第四类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定义,这主要是指技术史学家的定义。从现象上看技术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技术定义应当考察技术的历史性。技术本质中肯定也包含着某种超社会、超历史的因素,例如,技术体现人类改造世界的本能需要。历史学的众多定义一般是从这些方面出发的。

第五类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定义,即把技术和人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例如,尼

① 拉普著:《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采、马尔库塞等人把技术当作“意志的物化”。这类定义突出技术本质的主观方面，忽视技术的客观性，忽视技术与人类活动的联系。

第六类是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科学家给出的工程意义上的定义。例如，把技术定义为“设计”或“效率”。这一类实用但是没有普遍意义。

上述是比较常见的技术定义方法。此外，还有从“主观”、“客观”、“主客观之间中介”的特征把现有技术区分为三类的：第一类认为技术是主观的，把技术定义为心理、意志、经验、符号等；第二类认为技术是客观的，即把技术定义为工具、手段、活动、过程；第三类认为技术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把技术定义为知识体系、方法、关系。这三类定义都有片面性，不能反映技术是主、客体及其关系的统一体这一本质特征。

技术哲学的兴起

20 世纪技术哲学的兴起有着强大的现实需求，围绕着对“技术本质”的探索，技术哲学得以产生与发展。技术哲学是以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尽管德国哲学家 E. 卡普(E. Kapp)在 1877 年就出版了《技术哲学原理》，1927 年，德国学者德绍尔撰写《技术哲学》一书。但这门学科的出现却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技术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1966 年《技术与文化》的“面向技术哲学”专辑和 1972 年的《哲学与技术——技术的哲学问题读本》的出版，尤其是 1978 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成立与《哲学与技术研究》创办，以及第 16 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的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形成。

自 19 世纪初以来，从研究内容的角度分析，技术哲学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技术的本质、设计和结构问题；第二阶段着重研究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价值等问题；第三阶段开始深入研究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经济、技术与文化、技术与心理、技术评估等问题。

技术哲学从 20 世纪中叶以来大致于第三阶段形成三种学派。西欧学派的德国成为“分析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心，法国则侧重于技术伦理学讨论；英美学派着重对技术进行社会学和历史方面的探讨；前苏联和东欧学派注重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日本则在技术论的名称下重视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

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 C. 米切姆认为技术哲学中的问题分两类，一类是“认识

论”或“形而上学”问题,另一类是伦理学和政治问题。米切姆曾任美国技术哲学学会主席和《哲学与技术研究》丛书的主编。在他的技术哲学的理论中,他特别注重科学与技术的分野,并提出了“技术的思想”这一独特的论断,认为“技术是客体,技术是知识,技术是活动,技术是意志”。米切姆还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将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概括总结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传统,这是由德国的恩斯特·卡普和弗里德里希·拉普这样的工程师—哲学家发展的;另一种是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由奥特加(西班牙)、芒福德(美国)、海德格尔(德国)和埃吕尔(法国)相继发展。

一般认为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涉及技术观、技术与自然、技术与文化、技术与价值、技术与政治、技术的社会控制等。有学者指出,技术哲学中“技术的”(of technology)在一些情况下指的是主体或行动者,在另一些情况下指的却是客体,于是可区分出“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中,从两个不同方面分别列出“应当从哲学观点考察技术”的十条理由,大致对应上述划分。

评判已有技术概念的优劣和成败并不明智。各种技术理论的观点只是从不同侧面去观察、捕捉问题的本质,例如:

- (1)客观过剩物的生产,使人成为文化生物,因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人是必要的,并使人成为文化塑造的“技术生物”(Ortegay Gasset 1939);
- (2)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和在已达到的发展水平上,以理性方式获得并绝对有效的方法的总称(埃留尔,1964);
- (3)技术是服从于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体系(梅塞尼,1969);
- (4)由少数技术熟练者通过有组织的群体去理性化地控制更大的群体、设备和机器的系统(麦克德莫特,1969);
- (5)一种社会建构的社会实践(斯坦普,1989);
- (6)人类和非生命客体以多种方式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温纳,1991);
- (7)人类创造出来用于完成他们以别的方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的系统(克兰和卡什,1992);
- (8)建立在应用知识基础上,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显现于物理客体和有机组织形式上的系统(沃尔特,1992);

C. 米切姆从功能角度提出的技术定义成为社会学论述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类:

- (1)作为对象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等要素;
- (2)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能、规则、理论等要素;

(3)作为过程的技术,包括发明、设计、制造、使用等要素;

(4)作为意义的技术,包括意志、动机、需要、意向等要素。

C. 米切姆提出的是一个综合的技术概念,也是相对“软性”的定义,既可作广义理解,又可作狭义理解。

批判的技术理论

美国圣迭哥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安德鲁·费恩博格(Andrew Feenberg)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技术哲学家。过去十年中,他的重要著作显示出技术批判理论对技术的道德和政治批判依然有现实意义。国外也有研究者把技术哲学流派分成埃吕尔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实用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曾经是马尔库塞的学生和助手的费恩博格从来不否定他的思想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he 现在是技术哲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技术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设计,不同技术可能性中存在着选择。某一种设计或人工制造物的成功很难说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形成于特定环境。技术建构论将技术纳入社会学分析框架,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不是破坏性,只有根据它发展的社会背景才能充分理解。技术和技术实践被视为由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驱动的过程。

品奇(T. Pinch)和比杰克(W. Bijker)通过自行车发展的历史对此进行了案例分析:自行车最初轮子很大,它有利于提高速度,可作为理想的运动工具;由于骑在这样的车上,人的重心会很高,所以极不安全,作为大众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受到限制。这样在自行车作为运动工具和交通工具之间出现了矛盾。经过19年之久的改进发展,自行车最后变成今天这样一种基本模型,双轮变小,安全性提高,主要行使交通工具的职能,而这个过程就是用户造就的。

技术建构论认为,是社会群体将意义赋予技术。社会环境塑造人工制品的特征,技术制品向社会开放。换句话说,社会因素进入了这一解释过程。技术性的设计标准由社会环境定义,这环境包括都市、建筑空间、工作场所、医学活动、生活方式、信息传播等。

费恩博格充分吸收了技术建构论的研究成果,把包括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等人的见解,应用于技术发展过程的研究中,提出技术发展的内容和方向问题。费恩

博格相信技术系统具有惊人的柔韧性,它并不严格地强求社会;与此相反,技术系统能适应各种社会需要。技术只是互相依赖、愈加重要的社会变量之一。他认为社会价值能够决定并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制品是社会建构的。社会规则在技术发展和使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技术研究必须以这两个原则作向导:第一,技术发展不是单线,有很多方向,能沿着一个以上不同的轨道达到更高水平。第二,技术发展决定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技术的和社会其他的因素共同决定。

技术作为一个社会客体,理应像任何别的文化制品那样受到解释。如果忽略大部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连接,那么把技术看成是自主的客观就不奇怪了。在费恩博格看来,技术客体有两个可解释的方面,分别可以叫做技术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和技术的文化视界(Cultural horizon)。社会意义的解释表现在上述自行车例子中。文化视界是指一套共享的文化假设——这些假设构成生活的所有方面的不受质疑的背景。现实世界各种不可预测的态度在技术客体周围具体化,影响后来出现的设计变化,这些是技术进行的社会实质。社会群众最终决定技术客体的命运,决定它成为什么,决定它被重新设计成什么,决定它如何改进。因此,人们能通过研究技术客体牵涉的各种集团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来理解技术本身的发展。

费恩博格认为已经建立的多数技术理论都跳不出两种类型:工具理论(Instrumental Theories)或实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ies)。工具理论认为:技术由工具组成,工具是为了目的而以便于使用的方式由潜在的使用者设计的。技术是那些其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但却有助于其他各领域(如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价值创造的人工制品。于是工具理论要么把技术仅仅看成各种人工制品和设备的系统,要么更广泛地把它看作科学的应用并作出相应界定。实体理论把技术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技术的充分运用对于人和人的本性的意义远远超过使用它的表层目的。

绝大多数理论家对于技术的“唯工具论”持批评态度,技术与媒介、社会、受众的影响自然地落在关系构架上,应当重视技术的社会内容。而“实体理论”基本上把技术与工具看作相同的东西,如果想用工具或器械来实现任何目的,就必须把它们投入使用——为特定目的而设计出来的工具必须以特定方式使用。

实体理论更多谈论技术系统与技术实践,他们认为这些系统蕴含的价值超过那些通过技术手段而力图加以实现的预期目的。“效益”的工具标准就表明了这种价值存在。如果“效益”是成本与利润比例的测量单位,那么如何计算成本和利润